

CULTURAL
ACTIVITIES
can
Development
Shape
Development

文化舒适物

地方质量如何影响城市发展

吴军◎著



人民出版社



北京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Beijing Administrative Institute
北京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Beijing Population and Society Studies Center

文化舒适物

——地方质量如何影响城市发展

吴军◎著

Cultural Amenities:

How Qualities of Place Shape
Urban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曹 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舒适物：地方质量如何影响城市发展 / 吴军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

ISBN 978-7-01-018723-5

I. ①文… II. ①吴… III. ①城市文化—舒适性—研究—北京
IV. ①G1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2748 号

文化舒适物——地方质量如何影响城市发展

WENHUA SHUSHIWU——DIFANG ZHILIANG RUHE YINGXIANG CHENGSHI
FAZHAN

吴 军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天津鑫旭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18

字数：260 千字

ISBN 978-7-01-018723-5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文化舒适物——地方质量如何影响城市发展》一书提供了一个诠释后工业城市发展转型的新视角，从舒适物建设到地方质量提升，再到影响科技创新人才聚集和企业选址，进而影响地方经济社会进程。这种新思维对于当下中国城市与社区发展转型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这本书也是对新芝加哥学派最近 20 多年城市与社区研究的继承与拓展，尤其是作者对北京文化舒适物与城市发展的实证分析，弥补了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夏建中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空间品质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不仅影响着高科技企业的选址，而且还影响着高素质人才的城市流动与聚集。吴军博士提出的“文化舒适物”这一概念，为地方政府在提升城市空间品质方面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抓手”。这本书的推出将有利于推动国内关于舒适物、空间品质和城市发展之间的前沿研究。

——叶裕民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文化舒适物——地方质量如何影响城市发展》是一部与众不同、很有特点的专著。诸如咖啡馆、艺术馆、画廊、博物馆等文化舒适物在当代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准确分析文化舒适物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与城市各项功能的关系，是当前城市建设转型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本书在西方“城市舒适物”概念的基础上，选取“文化舒适物”这一独特视角，分析北京不同城区发展与文化舒适物的关系，得出了一系列新的判断和结论。该书是研究中国城市发展的一次创新性尝试。值得一读。

——祁述裕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化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化舒适物——地方质量如何影响城市发展》一书，从文化消费社会学角度，以率先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北京市为案例，围绕城市发展过程中“文化舒适物”的重要作用，对城市发展动力进行了详尽考察，为探索后工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方向和路径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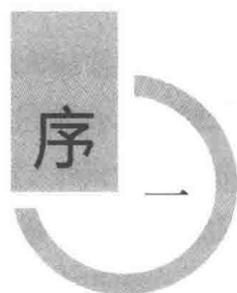
——朱伟珏 同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城市舒适物是一个新鲜、重要而有趣的话题。依我之见，“舒适场”似乎更好一些，这本身是一个值得重视和争鸣的概念。因为目前研究中，对城市的文化设施、景观、建筑以及非物化的氛围、价值观、情感等组成一个“场域”的整体性研究还比较缺乏。吴军博士从文化视角和地方尺度切入该难题，并结合北京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案例对此进行了深入的量化分析，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很具探索性，是一部城市研究的佳作。

——叶超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大城市发展文化动力研究”(项目编号:15CSH005)和北京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一般项目“北京创新创业社区发展的文化动力机制研究”(17JDSHB001)系列成果。同时,本书被列入“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学术文库系列丛书”。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家人们



在世界各地，城市已成为后工业经济增长的焦点。重工业雇用的工人在减少，而服务业人数则不断增长。许多关于个人服务和消费的舒适物（Amenities）开始越来越多地定义城市景观（Urban Landscape）：咖啡馆、餐馆、美术馆、瑜伽工作室、健身房、酒吧和夜总会等。这样的服务和设施往往需要人际互动和实体共存（Physical co-presence）。相较于是否消费和消费多少来说，消费什么和如何消费变得更加突出。随着消费机会的扩大和集中，城市和社区越来越多地被它们所提供的整套舒适物所定义，而不是单一的舒适物。

这些变化对城市政策和城市研究具有广泛的影响。吴军的贡献之一就是指出了这些变化进程并不局限于欧洲和北美。中国的许多城市正面临着工业化的挑战，以及正在寻找可替代的解决方案，一些发达的城市也在探索运用城市舒适物、消费和场景等元素来重新定位自己，从而为城市的繁荣与发展找到路径。在这本书中，吴军展示了这些变化在北京发生的情况，并为更广泛地分析中国其他100多个大城市奠定了基础。

吴军的研究延伸了类似主题的国际研究传统。事实上，许多城市研究人员正在逐渐研究诸如会议中心、阁楼和旅游景点等舒适物。特里·N·克拉克（Terry N. Clark）和霍夫曼·马丁诺（Hoffmann-Martino）提出了新政治与新经济主题相结合的新范式——强调消

费超过生产和个人作为消费者超越政党、阶级、种族和其他传统因素。类似主题的研究者还包括格莱泽（Glaeser）、佛罗里达（Florida）等。这些激动人心的举动鼓励了一种强调消费和舒适物的范式转变，成为城市发展的新驱动力。这些新的研究态势是建立在经典思想之上的，我们在此会作一些阐述。

自古代城市中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和论坛举办以来，城市舒适物已经与我们同在，尽管有像本杰明（Benjamin）这样的例外，他曾在分析城市增长中把它省略。这在北欧和北美尤其如此，在那里，一个苦行僧式的新教主义鼓励这种疏忽，把“非工作”称为准犯罪。例如，饮酒一直受到时间和地点的严格限制，人们在黑暗的酒吧里偷偷地进行，而南欧人或亚洲人在咖啡馆、餐馆或与家人一起喝酒。尽管如此，近年来许多北欧和美国城市舒适物不可否认的崛起，甚至导致了马克思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不甘情愿地认识并开始解释这些舒适物，如迪士尼化。

有的舒适物会影响居住在城市里的每一个人，比如清洁的空气。纯粹的公共产品是共同分享的，可能被所有人消费，而排他的代价往往是昂贵的^①。经济学家是这样定义的：“纯粹的舒适物是一种非生产性公共产品，比如没有明确价格的空气质量。”在实践中，以前的实证研究包括一些政府服务，如教育和公共安全。然而，现实中却很少有完全“纯粹的”公共产品或私人物品，大部分事物是介于二者之间。有的研究者还把这些舒适物称为“非市场交易”（Non-market transactions）。我们把其含义稍微放宽一点，像博物馆或餐馆这样的舒适物是半私人物品，因为它们收取使用费用，部分人群可能会被排斥在外。一些研究者在分析时忽略了将餐厅作为舒适物，因为他们把其当作仅仅提供食物的纯私人场所。但是，对于

^① 这就是美国两位领先市场经济学家乔科和特雷西的定义：“纯粹的舒适物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公共产品，比如没有明确价格的空气质量；在实践中，之前的实证研究还包括一些政府服务，如教育和公共安全等。”

想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人来说，餐馆不仅仅提供食物。不同餐馆的存在重新定义了地方情境（local context），即使是不吃东西的人也是如此。它们是当地舒适物系统的一部分，只不过不同地方情况有所差异。因此，我们将市场交易中公开指出的溢出效应作为舒适物，因为它们的累积效应可能会改变个人和企业的地点选择，从而影响人口增长或下降。

这个推理可能看起来很简单，但它颠倒了“传统的经济决定论”（Traditional economic determinism），即随着个人（和城市）变得更加富裕时，人们会消费更多的奢侈品，比如在高档餐厅用餐。在这种传统观点中，收入较高的个人促进了餐馆的兴起。但如果这个概念适用于个人的生活过程，那么把同样的逻辑应用到一个城市是错误的，这有力地说明了过度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什么？因为离散的个体不断地进出城市和社区，而城市的舒适物如歌剧院或湖滨地带改变得慢，影响个人的地方抉择。对于那些经常换工的、有才华的年轻人来说，尤其如此——甚至在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人平均每四年换一次工作。舒适物在城市里的丰富或贫瘠，人们以各种微妙的方式都可以感受到。

有些地方变“酷”，而另一些地方则落后、乏味、刻板。在过去的城市研究中，许多“酷”的部分比人口普查措施更微妙。企业家、当地公务员、新闻媒体、本地大学、音乐家、诗人、厨师、篮球运动员等都为这座城市的“酷”作出了贡献。由于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并且以不同的方式来衡量舒适物，所以从城市层面来分析只能捕捉到不同类别的人共享的总体效果。零假设是，舒适物在吸引人口聚集上并没有超越常规的移民措施政策的吸引作用。但是研究表明，这种零假设并不成立。

这种舒适物主导的城市发展模式的核心思想与图 1 中展示的其他两种经典发展模式形成了对照。经典理论认为，诸如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丰富的地区会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吸



引、聚集人才。人力资本理论则强调人才产生、创新和工作机会。舒适物理论拓展了二者的核心观点，并表明舒适物对人才的吸引、聚集作用更大，尤其是对创新人才，因为他们的流动性更大。尽管如此，这三种发展模式是相互嵌套的，每一种模式都毫无疑问地解释了城市发展的一部分。然而，解释了什么和解释多少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过去的研究中去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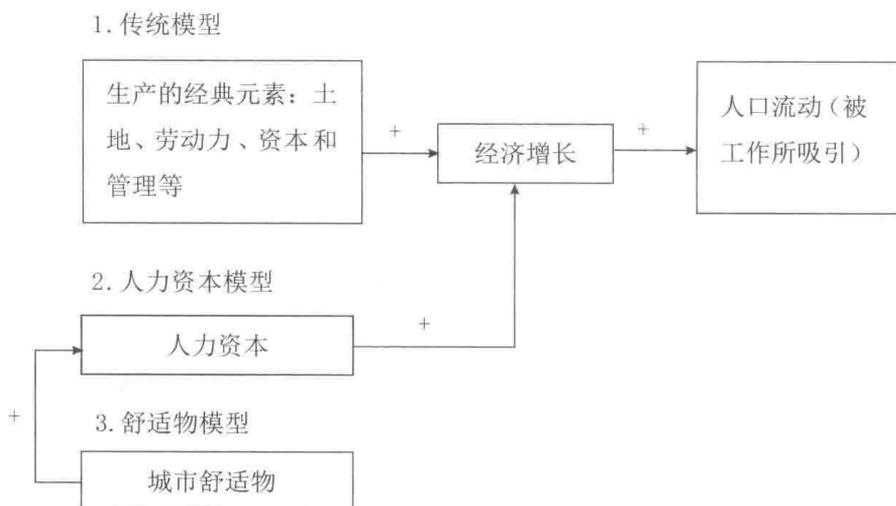


图 1 城市发展的三个连续模型

过去的研究积累了移民和城市动力方面的大量文献。过去经典研究分析了工作如何吸引人们，特别是在大都会地区。在通常情况下，研究揭示了人们是如何选择地铁区域内的地点的，而工作地点可能还不那么确定。贝瑞（Berry）和霍顿（Horton）通过对1910—1960年土地价值决定因素的分析，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传统模式已经弱化。他们发现每个个体系数（距市中心的距离、人口密度等）以及整个方程中的权数一直下降。那么，到底是什么推动城市增长呢？

近年来，人力资本一直是经济发展工作的主攻方向，这表明居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能力较强的地区发展较快。但是人力资本往往

被看作生产要素，这意味着人力资本要么像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那样固定在一个地方，要么跟随工作机会和资本，而不是自主定位（自主性）。2002年，佛罗里达通过给那些在创造力明显的职业或行业中工作的3000万美国人加上“创意阶层”标签，来扩展这一学术传统。但是，正如佛罗里达和格莱泽一样，我们认为，舒适物与人力资本具有共振效应（Amenities act jointly with human capital）。为什么？它们就像奶酪，或更像超星级的食物一样，吸引人才。它们把一个位置转化为一个场景，一个很“酷”的场景。我们认为，人力资本理论在解释城市发展方面尽管是正确的，但还不够充分，它并没有回答人才最初在哪里聚集以及为什么会聚集的问题；更何况，这些人才本身具有很高的流动性。因此，我们将舒适物理论加入这个分析模型中，来结束这样的因果循环，与人力资本一起来解释城市发展。这种转变具有深刻的政策性影响。近几十年来，财政压力、削减补助、敏感的市场管理导致许多地方政府寻求扩大税基。如补贴公司、税收优惠、土地整理等。尽管如此，大多数研究发现这些传统的以企业为导向的激励策略并不起作用或者具有非常弱的影响。

一些地方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改变，意识到舒适物建设越来越重要。通过节日、自行车道或文化来提高“生活质量”的努力不仅被认为是消费的中心，而且是经济发展的中心，经济发展正日益受到消费关注的驱动。怎样驱动？许多舒适物都是萨缪尔森式的公共物品，如果公司破产，它们不会像对一家公司的付款一样消失。舒适物使该地区所有公司、公民都受益。当地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开发，如舒适物，是由更好的学校、工人培训项目等辅助的。公共物品政策意味着出现更少的那种在阶级或种族冲突或增长机器范式中出现的零和游戏冲突。许多国家的城市正在发现（拉丁美洲各地）清洁度假区和历史遗迹（如中国）的巨大价值，这与全球旅游业发展紧密相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旅游业已经变成了许多地方

的支柱产业。如果地方政府采取舒适物策略，就可以在国内外城市竞争中保持优势，但重点不在于企业及其所在地，而在于作为消费者、旅游者、劳动力的居民本身。

文化和娱乐是芝加哥最大的产业，是纽约的第二大产业，仅次于金融。人们逐渐意识到，在选择工作之前或选择自己居住地时，更多关注舒适物。可以肯定的是，迁移者不再是从农村出来的求职者，尽管其中还存在着一些。城市经济学家理查德·穆斯（Richard Muth）用联立方程模型（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s）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工作吸引人才聚集的传统发展路径，往往比人才聚集吸引企业的发展路径更微弱。重要的结论是：两种迁移类型在统计上都重要，而在新近的研究中，新的类型（人才聚集影响企业选址）对解释美国全部劳动力流动更有意义。

佛罗里达和其他一些学者强调，人力资本并不是聚焦整个劳动力，而是关注创新、专利、精英领导者和聪明的风险资本。这些都会涉及更多受过高等教育和更富裕的人群。除此之外，研究的更高目标是建立一个分析框架，包括不同类型的人——富人和穷人、受教育程度高的和低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都可能是由私人物品（工作和收入）以及希望获得或享受城市舒适物的动机所驱动的。可能是最富裕的人和那些完全不工作的人（如退休人员）更关心和在意舒适物，而就业机会较少的人则更看重工作（因此更适合图1的传统模型）。但是，对于有才能的劳动力来说，更多的是受工作和舒适物组合的驱动，而且更多的时候是在二者共振效应的情况下作出决定。同样，由于整个经济或其中的一个部门所创造的就业机会超过了现有劳动力数量，所以应该提高工作待遇和工资水平，并考虑允许让更多的人享受舒适物带来的宜居。相反，随着经济或行业的下滑，人们对工作机会和舒适物也应该重新考虑。

吴军对北京的研究拓展了这一命题，更广泛和很微妙的考虑为

探讨中西城市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性比较铺平了道路。我们希望他的宝贵贡献能够在城市研究和城市政策的新方向上引发大量的讨论与对话。

[美] 特里·N. 克拉克
[加拿大] 丹尼尔·西尔*

2018年1月

* [美] 特里·N. 克拉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美国市长会议等机构的智库专家；[加拿大] 丹尼尔·西尔：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到，我国当前的城镇化率不足60%，和西方发达国家平均80%的城镇化率相比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城市不仅仅能够吸收农村人口、释放更多土地资源，也承载了中国产业转型和升级的重要使命。集聚的人口、变革的生活方式和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均对城市的建设和规划，尤其是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和各类商业的建设规划提出了新的要求。过去让位于工业的各类“软件”成为许多人在考量城市居住地的重要参考指标。

吴军先生的最新著作从“文化舒适物”这一概念入手，详细介绍了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政治学与城市地理学等学科交叉领域关于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理论成果。“Cultural Amenities”作为一个在西方城市发展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和探讨的概念，在西方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解读方式，然而在中国，对这方面知识了解的人非常少，熟悉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作者综合各派西方学者对其的理解和研究成果，将其翻译成“文化舒适物”，恰如其分地在中文语境中表现出这一类型事物的独特性质。对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而言，工业已经不再是城市发展的主流，通过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宜居的环境、良好的公共设施等吸引高素质、高收入人才定居，这才是后工业时代城市发展的趋势。

北美和欧洲著名的国际都市都已在 20 世纪末完成了这一转型。巴黎、伦敦、纽约、芝加哥等已经成为世界都市建设的标杆，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城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和首屈一指的大都会，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建设发展的先驱城市。同时，作为国家首都和中国面向国际的窗口，北京承载着多种重要职能，吸引着最有竞争力人才。因此，作者选择北京作为研究对象，这是阐述文化舒适物理论的绝佳选择。可以说，本书是中国第一次如此详尽地对城市文化舒适物进行的研究，从关注角度和学术前沿性来说，都是十分值得赞赏的。

作者对数据的选择采样同样也体现了他对文化舒适物的深刻了解。在对美国城市的文化舒适物的“场景理论”研究中，特里·N·克拉克教授采用了黄页（Yellow page）和统计局的邮政编码商业数据（BIZZIP）。相比较而言，中国都市的商业更加瞬息万变且十分倚重移动网络平台的传播。结合这一特点，作者明智地紧跟时代，利用了多个互联网平台的数据，结合北京市统计局官方数据，从居民的城市生活角度对舒适物进行分类整理，并根据舒适物类型和地点分布绘制了多种图表，将北京的文化舒适物分布和类型直观地展现了出来。同时，结合北京多种功能区的特点和人口、经济和自然状况，对各城区在不同文化舒适物的情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除此之外，作者利用强大的数据库，对各种文化舒适物与各个城区功能分区进行了多种统计计算，展现了北京 16 个区中文化舒适物的分布与经济增长、科技创新、房价变动和社会活力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各类各规模文化舒适物与以上各要素的相关性和显著性分析，进一步以事实佐证了文化舒适物对后工业时代的北京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不同种类的文化舒适物对各种城市功能的提升上具有卓越的意义。依据对数据的解读，作者从人才与文化舒适物的互动关系和对当地的经济影响的角度出发，对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提出了有建设性的意见。相信这些意见能够对北京乃至全国的城